

日本在历史上向来是我国对外贸易和科技交流的最密切的伙伴之一。北宋时仅载入史籍的中日两国通航就达到70余次。宋代校正的大量医书,陆续传至日本,对日本本草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日本平安朝出现的古本草诸抄,就引用了不少宋代本草。如日本最早的《香字抄》(约成书于1047年)引用了《开宝重定本草》;《香要抄》(约成书于1146年)引用了陈承的《重广本草图经》。藤原信西(卒于1159年)的《通宪入道藏目录》中,著录了《大观本草》。释莲基的《长生疗养方》(1184年)节抄了《大观本草》414种药物的性味功用,等等。

中日两国的药材交易也很频繁,平安时代传入日本的主要是从中国转卖过去的香药。中国特产的茶,此时被日本僧人荣西引种到日本。镰仓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多为常用药物,如甘草、川芎、当归、巴豆、大黄、龙眼、辰砂、雄黄、炼蜜等。“唐药”在当时是很受日本人欢迎的。由于数量少、价格贵,一般只能供日本上层人物使用。日本在同一时期向中国输送的有水银、鹿茸、茯苓、硫磺等。

高丽在北宋时也屡次遣使求医。元丰元年(1078年),高丽王病,入宋求医,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德随带药物百余种前往诊视。此后在1103年和1118年,宋朝廷又两次派医官到高丽传授医术。新罗人参不断地从河北榷场和闽中输入我国。大观、政和年间,广州、泉州请建“番学”,类似于现在的留学生院,高丽也派人就学。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,医药知识也相应得到了传播。

宋承五代之余绪,于开宝四年(971年)置市舶司于广州。此后又在闽浙沿海各地置司,将市舶所得税收,充填国库。为了鼓励海舶商人往来,政府采取了一些招诱奖掖的办法。当时外药输入的主要口岸是扬州、广州、泉州、明州、温州、钦州等地。据统计(穆德全,宋代以前的外来药物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,上海中医药杂志,1957,(9):4),从960—1178年间,外国朝贡633次,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交流的计98次。通商的国家约27国,主要是大食(阿拉伯)诸国、三佛齐(苏门答腊岛南端)、阇婆(爪哇)、占城(越南南部)、真腊(柬埔寨)、天竺注犍(印度南部)等地。通过“香料之路”,中外药物交流得到很大的发展。由于民间治疗用药所需,北宋政府于太平兴国七年(982年)放松了对海舶的禁榷。除犀角、乳香等8种物品作为政府专卖之外,另37种药物(如木香、槟榔、石脂、硫磺等)均列为可通行之品。南宋时进口药物的数量更多,其中以乳香为大宗。(宋史·大食传)云:“大食蕃客毗辛贩乳香,值三十万缗。”可知其时商贾对香药的贸易规模。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海船中,载有大量的香料药,包括降真香、乳香、槟榔、胡椒等,就是宋代与海外药物交流的明证。同时期我国向外输出的药物也不少,据统计至少有58种之多,如附子、肉桂、黄芪、甘草、川椒、川芎、姜黄等,均是常见的出口药。

宋代中外药学术交流,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本草学内容。大量的香药输入,对宋代的医疗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## 第六节 金元时期的本草学 (1115—1368年)

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金朝,先后灭辽和北宋,统治中国北方达120年。蒙古族于1206年建国,灭西夏后于1234年灭金,1271年改国号为“元”,1279年灭南宋,终于统一中国,疆域横跨欧亚大陆。

女真族与蒙古族虽然先后入主中原,建立政权,但在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方面,仍然受北宋悠久的中原文化的影响,故传统

科学文化得以延续发展。

金代吸收并继承了以封建主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,与佛、道、萨满教相结合,作为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。尤其是到了号称“小尧舜”的金世宗时期(1123—1189年)，“明祸乱之故，知吏治之得失”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，呈现一派“群臣守职，上下相安，家给人足，仓廩有余”（《金史·世宗纪》）的安定繁荣景象，从而为金代的政治经济、科学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元代建立后，也推行了汉法，提倡以儒学为主的汉族传统文化，同时还采取鼓励农垦恢复生产的一系列政策，国民经济慢慢恢复，元代统一全国后南北科学文化也得以交流，整个国家的状况虽没有达到南宋的旧观，但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景象。当《马可波罗行记》在欧洲广泛传播以后，中国和东方的像神话般的财富，使欧洲的商人和封建主醉心向往，说这是“远方契丹的诱惑”。元代发达的交通和商业贸易，促进了对这些财富的开发和利用。元代的宗教文化也很发达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，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并传，从而增进了与印度、阿拉伯乃至欧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。

宋金元时期战争频仍，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，人民流离失所，瘟疫广泛流行。然而，社会的迫切需要却也促使了临床医学的发展。金元医家针对当时他们在疾病诊治中出现的问题，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“古方新病不相能也”（《金史·方伎传》）的见解，“用药治病，多出新意，不用古方”（《鸡峰普济方》）。由于各自的临床经验的不同，以及认识的局限，各家之说彼此相左，金元学派之争由此产生，开创了一代争鸣的学风，进一步促使中医学新的发展。

伴随医学的演进，金元时期本草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主要是注重临床用药的实际需要和药性理论的探讨。金元本草与传统药学的区别点大致有三：一是以《素问》药理学为指导探讨药物的性能、应用，完善药性理论，不涉及传统本草所重视的药物基原、形态、品质等药学内容。二是着重记述药物主要功用，药性标识一新。三是收载药物种数较少，多为医家的常用药。

此外，元代的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也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序幕。

### 一、本草文献

金元时期与宋代相比，经济、文化发展缓慢，本草学虽然在某些方面有重要突破或发展，但其著作规模不及前代，种类也大为减少。

#### （一）概述

此期的综合性官修本草明显退居次要地位，且基本内容无不与《证类本草》有关，如元世祖命撒里蛮、许国桢兼诸路医学教授撰成的《至元增修本草》、元代医官尚从善的《本草元命苞》，惜前书已佚失。

这一时期以临床实用本草占主导地位，且主要出自临床医家之手。如金代刘完素的《素问药注》、《本草论》（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第九），张元素的《珍珠囊》、《洁古本草》，李杲的《药类法象》、《用药心法》，元代李浩的《诸药论》，王好古的《汤液本草》，詹瑞方的《本草类要》，朱丹溪的《本草衍义补遗》，徐彦纯的《本草发挥》等，这些大多属于同一体系，重在阐发药性理论，提炼概括药物功用。

食疗本草或食疗类著作有较大发展。主要有元代忽思慧的《饮膳正要》、吴瑞的《日用本草》，以及李鹏飞的《三元参赞延寿书·饮食有度》、汪汝懋的《山居四要·养生之要》。至于清代才出现的题为元·贾铭所撰的《饮食须知》，显系托名之作。